

生态系统管理与绿色发展：关注生物多样性

——在年会开幕式上的特邀发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国合会委员 施泰纳

2010 年，作为联合国指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已成为发人深省的一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评估，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所表明的那样，在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这个仪表盘上，已有太多的红灯显示。《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包括 UNEP 在内的各方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于今年 5 月发布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3》。报告指出，世界正快速逼近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诸如珊瑚礁、淡水这样的生态系统将无法恢复。

《生物多样性公约》——令人乐观的信号

10 月 30 日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由 UNEP 负责管理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颠覆了以往的悲观情绪，围绕全球自然生态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决策。这一时刻将可能载入历史，因为我们重新发现了地球自然资源或建立在自然基础上资产的真正价值。会上，各国代表对新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到 2020 年将陆地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扩展到 17%、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达到 10%，更广泛的战略规划还包括降低已知濒危物种的灭绝风险。同时，会议还同意研究如何调动资源，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计划中的新目标。此外，缔约方各国政府还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国际管理制度议定达成一致，这正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缺少的一个重要支柱。该议定书为世界各国在从动物、植物和真菌中获得遗传资源方面如何进行合作确定了基本规则，以及如何分享从遗传资源产生的收益，例如，当一种植物的遗传资源转化成商业产品后，如药品，那么，保存和管理该种植物几千年的国家和社区如何来分享惠益。



科学和经济学发展——认识自然价值的基础

科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飞速发展，使人们对于自然及其价值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入。在 1992 年缔结《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姐妹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防治荒漠化公约》时，科学研究结果已使人们看到许多风险，而今，这些风险正迅速成为现实。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会议上，各国政府同意成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类似于自然方面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生物多样性公约》对此表示支持，目前正等待着第 65 届联合国大会的批准。

在名古屋《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的伙伴关系项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发布了综合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森林砍伐按照现在的速度持续到 2050 年，全世界的自然资本每年将损失 2 万亿—4.5 万亿美元；包括蜜蜂在内的植物授粉昆虫，每年提供服务的价值估计为 1530 亿欧元，占全世界农产品产量近 10%，替代这些自然服务功能将付出巨大代价。例如，在越南，种植和保护大约 12000 公顷的红树林的成本仅 100 多万美元，但此举动每年可节约海堤维护费用超过 700 万美元。

各国采取行动——实现全球目标的保障

尽管我们还没有实现全球目标，但许多国家已经在自然经济方面付诸行动。例如，中国从 2000 年到 2005 年种植了 2000 万公顷的森林，这是中国长期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年六月，为支持生态系统管理和 TEEB 的工作，联合国环境署出版了一份关于生态系统恢复或修复成本效益的新报告，其中引用了中国湖南省洪湖的例子，那里禁止了不可持续的捕鱼方法，重新引入本土鱼种和水草，改善了遭到严重污染和退化的洪湖水环境。2003 年以来，中国江河湖泊的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像东方白鹳这样的珍稀鸟类在 20 年后重返它们的栖息地，目前，渔民的收入是原来的 3 倍，比全国人均水平高 5.50 美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伙伴关系项目，通过保护鸟的 5000 公里的飞行路线来挽救濒临灭绝的西伯利亚鹤。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给中国的生态系统，而且给西伯利亚和伊朗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明显好处，促进了对大约 700 万公顷湿地的保护和恢复，这些湿地的生态系统无论在环境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非常重要。

即将在巴西里约召开的 20 国集团会议有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绿色经济，目的是整合全球良好的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以进一步发挥投资的作用。这也许会表明全球经济正在浪费金钱并造成环境退化，如果花的支持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物公约上



会更好。今年五月，UNEP 关注渔业补贴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以及它对鱼类资源枯竭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绿色经济的方式投资 80 亿美元，相当于对海洋保护区和可贸易的渔业配额的 270 亿美元的补贴，这将使每年的捕捞量提高到 1.12 亿吨，同时在未来 40 年给渔业、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带来总共 1.7 万亿美金的利益，把全世界渔民家庭（包括小规模、使用传统方式捕鱼的渔民）的总收入从每年 350 亿美元提高到大约 440 亿美元，并且通过为近 10 亿人提供初级蛋白质支持了扶贫大业。

TEEB 和绿色经济都证明了这样一点，即大自然是那些不富裕人们的财富之源。农村和林区贫穷居民的所有生计来源都是由生态系统和其他非商业物品提供的。在绿色发展中，将有新的动力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到 2020 年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利用自然功能——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

我们要用更加智慧的方法在生态系统管理和其他挑战之间建立联系，这些挑战包括扶贫和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通过减少森林砍伐或森林退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REDD 或 REDD+）”项目即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该项目强调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森林保护提供资金，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扭转生物多样性减少趋势的同时，为当地居民创造新的收入和生计机会。

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同印度尼西亚就“蓝碳项目”进行合作，据估计，红树林、海草和盐沼共吸收了全世界 50% 的交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此外，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GEF）新设立的碳收益项目中，中国、肯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结成了合作伙伴。该项目评价不同的土地管理形式，包括耕作方法如何有助于把碳固定在土壤和植被中，这是走向为可持续的土地管理付费的第一步。

认识自然价值——实现转型与增长的关键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把迅速发展的科学、试点项目和经济理论转化为国家经济决策的核心，从而使我们的发展选择能够更加充分地考虑全局。过去的经济错误，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自然的真正价值，只有认识到这种价值，我们才可能让经济成功地转型和增长。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巴西和印度宣布了 TEEB 国家规划，包括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表示了同样的兴趣。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接到了近 30 个国家和组织的请求，要求为他们提供绿色经济方面的建议服务。世界银行同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正在推广绿色核算行动计划，最初有大约 10 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中国在这方面也在积极采取行



动，例如，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指定用于环境保护和落实前瞻性政策，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中国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进行合作，扩大其对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国家和区域层面项目的支持。合作项目包括：把 TEEB 结合到 12 个省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规划与实施中；“遗传资源的安全”，把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安全，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等概念紧密结合；效仿西伯利亚白鹤湿地项目的良好实践，管理和确保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中国东北和区域河流系统，如湄公河和长江上游流域的湿地最小生态水流。

在过去的 100 年里，人类或许认为已经逃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但历史书可能会这样记载：在 2010 年，人类终于意识到，这个印象最终不过是个错觉。自然系统对于经济、社会以及精神维度的作用，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2010 年还可能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现低碳、资源高效利用和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良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不仅需要可持续的交通和能源系统等硬性基础设施，同时也需从森林、淡水资源到珊瑚礁、红树林，一直到大气等自然生态系统这些软性基础设施的可持续。

我非常赞赏中国，非常尊重国合会。国合会主要在进行国际环境合作，环境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作为国合会，应该考虑到中国目前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合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可以向全世界证明国合会不仅非常关心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就全世界的发展提出建设性、创新性的建议。